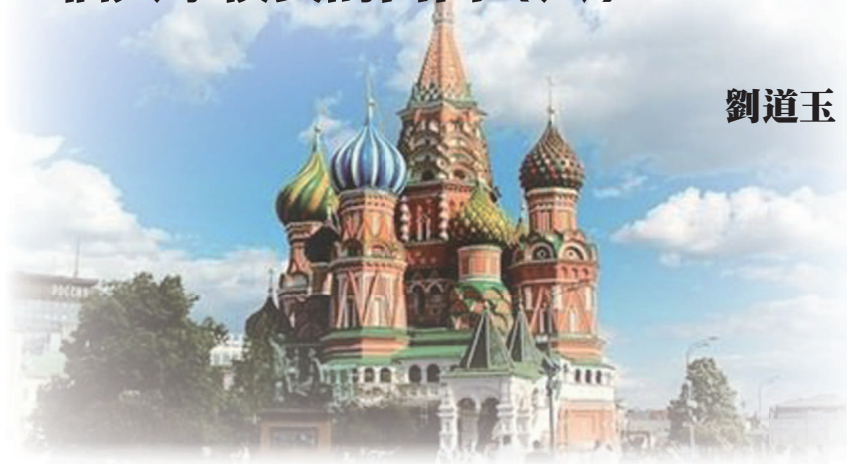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八）

劉道玉



六、我在莫斯科唯一的夏天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中的黃金季節，平均氣溫在攝氏 25 度左右，是旅遊的最好時機，對於長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蘇聯人來說，即使 25 度的溫度，他們也感覺炙熱難忍。每逢到了這個季節，莫斯科人不分男女老少，幾乎是傾巢而出，或到河裡游泳，或沙灘接受日光浴，或全家到郊外的森林野炊、露營。有條件的高薪階級，他們會選擇到克裡米亞療養院去休假，或到國外旅遊消遣。夏天對於莫斯科人來說可謂「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末陰陽正可人。」

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這一切不僅是奢望，而且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加以抵制的。那時正值中蘇兩黨論戰最激烈的階段，大使館對留學生的思想抓得很緊，內部制訂了一些管理規定。例如，規定留學生除上下課外，不得一個人單獨外出，如必須外出應當有兩個人以上同行；夜晚一律不得外出；除導師以外，不得到蘇聯人家作客。生活上要節儉，不得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要站穩立場，防止思想上變「修」了。大使館還動員說：「國內遭受到重大自然災害，經濟困難，老百姓吃不飽飯，你們應當節約，畢業回國路費自己支付，以減少國家開支。」說實話，那時我們都擁護大使館的這些規定。我們除了維持必須的生活費、

46 書籍費以外，把大約一半的獎學金攢起來，以便做回國旅費或上交給國家。在這種形式下，無論從思想管理或從經濟條件看，我們都不可能自費旅遊。對於我們來說，過革命化的暑假才是最好的選擇。

大約 1962 年 7 月中旬，蘇聯科學院國際部通知我們，他們準備組織各國留學生到一個叫戈爾次克的休養所度假，時間三天，經費由蘇方負擔，邀請我們參加。我們把這個通知向大使館作了匯報，大使館考慮到這是一次國際留學生的集體活動，時間也不長，且蘇方負擔經費，因此就批准我們十多人參加這個活動。

戈爾次克位於莫斯科的遠郊，是一派集體農莊的景象，我們到達時正值夏收季節，收割機在不停地工作。過去我只在電影裏看到過蘇聯的農莊，它被視為農村通向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也是中國廣大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白天我們被組織去參觀農莊的畜牧場、學校、訪問農戶，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當他們知道我們是中國人時，他們毫不掩飾地說：「中國人民偉大，蘇中論戰是蘇共挑起的，我們不支持蘇共的立場。」我們對他們的友好態度表示感謝，並表示要為加強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不斷努力。

8 月初，我隨即將畢業的老同學自費到列寧格勒參觀，時間世一周，這也算是唯一的一次夏遊吧。那些老同學在莫斯科生活三年多，他們還未離開過莫斯科，相比之下，我算是幸運的了，剛來半年就趕上了這趟「末班車」。

本來大使館是不允許留學生旅遊的，但為甚麼這一次自費去列寧格勒的參觀能獲得批准呢？這實質上是在革命的名下組織的一次夏遊，是反修思想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列寧格勒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發生在這裡，有著豐富的革命文物，早就對我們有著聚大的吸引力，這一次我們能身臨其境，直接受到列寧主義的教育，的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感到十分高興。

我們是乘火車由莫斯科到達了列寧格勒的。返回時因水災，經請示大使館的批准，我們乘飛機回來。在列寧格勒我們首先是參觀十月革命博物館第一屆蘇威埃會址，阿夫洛爾巡洋艦實物，以及列寧工作過的地方的舊址等。接著，我們參觀了聞名遐邇的沙皇的夏宮，它的規模之大，建築藝術之精美，特別是千姿百態的噴泉，栩栩如生的雕塑，給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還參觀了列寧格勒的油畫展，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西方的油畫。最後，我們又參觀了列寧大學，蘇聯科學院高分子化學研究院，與在那裏的中國留學生舉行座談，交流了學習與研究的經驗。

參觀的時間是短暫的，但學習到的內容是豐富的，既有革命教育意意的內容又有多彩的的藝術欣賞，使我大大開擴了眼界。我們帶著輕鬆愜意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很快我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學研究。莫斯科的夏天不僅是旅遊的季節，而且也是工作的好時光。

這是在莫斯科度過第一個夏天，也是最後的一個夏天，在第二年夏天到來之前，我永遠地告別了它。

七、“反修”戰士

20世紀60年代初，在中蘇兩黨之間，以至於後來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為首的部分世界各國共產黨與以蘇聯共產黨為首的其他依些各國共產黨之間，發生了公開的、激烈的論戰。這些分歧，最早起於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祕密報告”，其中對史達林進行了全盤的否定。後來經過蘇共二十一和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雙方的分歧又進一步加劇了，以至於發展到公開論戰，甚至嚴重地影響到兩國正常關係的地步。

中國共產黨堅持認為這些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則問題的分歧，是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問題，例如：

史達林究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劊子手、強盜、黨棍？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是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用什麼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關道路？

美帝國主義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還是明智的和平使者？

甚麼是防止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保衛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狄托集團究竟是叛徒，還是同志？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究竟要不要社會主義陣營？究竟在甚麼原則的基礎上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上圖：難得參訪列寧格勒（最右為劉道玉）

總之，所有的分歧都可以歸結於對“和平過度”、“和平競賽”、“和平共處”的認識上。針對這些分歧，中國共產黨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是馬列主義的叛徒；而蘇聯共產黨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和分裂主義。到底如何看待 40 年以前那場意識形態的爭論？如何看待修正主義？人類已進入 21 世紀，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蘇兩國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蘇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且一切都還在變化著。因此要評價納格時期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的鬥爭，顯然我個人是沒有這個水準的，也許要由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家去評價，甚至要由未來的歷史去做結論。

在這本自傳中，之所以涉及到反修這個問題，因唯我在這個事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是一個見證人。我只是想把我當時的思想認識，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個人的得失，如實的寫出來，因為它畢竟是我個人經歷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事實勝於雄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真理總是越辯越明。在中蘇兩國的論戰中，中國共產黨建議兩黨訂立一個協定：雙方在各自的報刊上，對等地發表對方批評自己和自己批評對方的已經公佈和將要公佈的檔、文章和資料，讓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辨別誰是誰非。作為列寧主義的政黨，相信人民是一個基本原則，這一公平建議本應得到蘇方的贊同，然而卻遭到了他們粗暴的拒絕。與此同時，他們召開了

六千名黨員的積極分子大會，每月發表近千篇攻擊中共的文章，掀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反華運動。他們的所作所為，再一次暴露了蘇共“老子黨”的惡習和頑固的大國沙文主義的真面目。

當時中蘇兩國的論戰，不僅影響到兩國關係，而且還日益危及到留學生的學習與安全。我們留學生訂的《人民日報》、《紅旗》等報刊，被蘇聯海關全部沒收了。我們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沒收，有些研究生的學習受到刁難，我們的行動受到便衣員警暗地監視或跟蹤，等等。面對著蘇方的封鎖和挑釁，我們留學生應當怎麼辦呢？大使館對我們總的要求是：旗幟鮮明，站穩立場，堅持原則，注意策略。具體來說，要求我們做到：

對於蘇方沒收報刊的行為，要向蘇方有關當局交涉，堅持打破封鎖；如果在學習上遭到刁難，要多做工作，特別做好導師工作，盡量爭取到合法的權益；對各別人的惡意攻擊與挑釁，要據理揭露與反擊；對一些對我們友好和表示支持我們的蘇聯朋友，向他們表示感謝，注意保護他們，使他們免遭蘇聯當局的迫害。

在蘇聯公開場所，不主動挑起矛盾與爭論，後發制人。

對待這些原則與要求，絕大多數的中國留學生是堅決擁護的，在行動上是力求貫徹執行的。但也有極少數留學生態度曖昧，抱著“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態度，甚至對組織上佈置的任務採取陰奉陽違的態度。當時，我是黨支部主席和留學生會主席，在思想上認為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確實變修了，而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是堅持馬列主義的。因此，我決心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積極完成黨組織佈置的各項任務，在反對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中起帶頭作用。我深知參加這些活動，可能會影響我的學習，甚至是有風險的，但是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全然未顧及到個人的得失與安危。

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蘇聯全國總工會於1962年4月30日晚，在公會的圓柱大廳召開了慶祝招待會。應邀的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會代表團，有關國家大使館的官員，以及各國留學生代表。我作為中國留學生代表，也應邀參加了。在赴會前，我請示大使館在會上我應持甚麼態度，大使館的負責人對我說：「現在蘇聯當局推行修正主

義路線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利用一切國際組織和會議，兜售他們的修正主義觀點，我們的觀點是針鋒相對，凡會必定參加，他們在哪裡放毒，我們就在哪裡消毒。」聽了使館的指示，我心中有數了，也作了在會上的發言準備。

我如約赴會了，這是我有始以來第一次參加外交場合的會議，有緊張情緒是難免的。參加會議的除蘇方工會的負責人外，還有來自各國的代表團合留學生共一千多人。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辭中，大談“三和一少”（即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共度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鬥爭），他認為“和平共處是蘇聯及社會主義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各國人民革命鬥爭取得勝利的前提”“是幫助國際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

這顯然是修正主義的觀點，是對列寧主義的背叛，我聽得有些不耐煩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滿情緒，並寫了一張紙條給會議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國留學生發言，像蘇聯工人階級表示兄弟般的節日祝賀。我的要求被接受了，在幾個國家代表發言之後，我被請上主席臺發言。我鎮定了情緒，一再提醒自己不能急躁，不能失態。我首先對會議主席安排我發言表示了感謝，像蘇聯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國朋友們表識了節日的祝賀。接著，我著重就和平共處闡明瞭我們黨的觀點，我說：「列寧一向認為‘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是不能和平相處的’因此，和平共處絕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不可能是各國工人階級爭取勝利的前提和最好方法。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些觀點，那麼世界各國勞動人民，將永遠備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我的發言當然引氣蘇聯官方的不快，但是卻贏得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會後，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國家留學生，紛紛來到我的座位前，對我表示支持。

在反修反霸權鬥爭中，我經歷的另一重要活動是發生在六月下旬。根據大使館的指示，我和留學生李德宇、張書縉到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去交涉，是秘書長和一位秘書小姐接待我們的。

首先，我們介紹了最近一個時期蘇方在我們留學生中製造了一些事件，如留學生的中文報刊被沒收、信件被拆閱、居所被監視、學習條件受刁難等，希望引起蘇方的注意，採取有效措施，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對於我

們的指控，蘇方拒不承認，說是我們捏造的。當我們出示了有關照片和被拆信件物政以後，他們仍然百般抵賴。同時他們指責我們留學生研究單位散發中共的檔是犯法的，這不符合留學生的身份。我們申辯道：「中蘇兩黨的論戰，完全是蘇方挑起的，只許你們黨賜意歪曲和攻擊我們，而向蘇聯人民隱瞞和封鎖我們黨的正確聲音，這是典型的霸權主義的表現。」這種你來我往的辯論，持續了一個上午，氣氛是緊張的，言辭也是激烈的。可想而知，這種辯論是不會有結果的，最後也只能不歡而散。

當我們離開主席團時，又把一摞我們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從一評到九評》，以及中共致蘇共中央的四封信遞交給了秘書長。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拒絕，是何用意我們不知道。

最後，我說：「秘書長同志，我們希望你重視我們所反映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決，我們還會再來找你的。」

八、“不受歡迎的人”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學習和研究工作很順利，已經通過了一門課程的考試，寫出了三篇論文的初稿，克努揚次院士對我取得的成績是滿意的。

我原本想在例行會見時，向克努揚次院士匯報我的第二階段研究計劃，將三篇論文交他審改，並商定第二課程《元素有機化學》的考試時間。可是，突然發生的事件改變了這一切，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我清楚地記得，1963年6月28日下午4時，我駐蘇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負責人劉天民同志突然來到我的實驗室，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做實驗。他帶著急促的口氣說：「情況十分危急，你現在已經不能回宿舍了，請帶上身邊有價值的資料馬上跟我到大使館去。」我未問緣由，已意識到出事了。我順便問了一句：「要不要向導師或研究室的人打個招呼？」他說：「不必了。」

到了大使館，我被徑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辦公室，他已經在那裡等候我了。他起身握著我的手說道：「昨天蘇方已照會我方，宣佈了5位同志為不受歡迎的人，其中有你，

52 蘇方限定你們 48 小時離境，為了安全起見，你現在寸步不能離開大使館，準備後天回國。」潘大使接著說：「當然，我國外交部已就這一旨在破壞兩國關係的事件，向蘇聯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同時我國政府也採取同等的措施。」

接著，潘大使把蘇方 6 月 27 日的照會遞給我，那上面有關我的內容是這樣的：

“……在蘇聯科學院各研究所學習的中國研究生學生會負責人劉道玉的行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他在蘇聯科學院科學聯絡部的工作人員中散發這一文件。該部工作人員提醒劉道玉注意，他的行為是不許可的。但是，他並不理會這一點，他和他領導的中國研究生繼續在蘇聯科學工作者中散發信件，在蘇聯和其他國家公民居住的蘇聯科學院集體宿舍內到處散扔。6 月 25 日，劉道玉、研究生李德宇和實習生張書縉在蘇琳科學幹部提出適當要求後，不但沒有制止中國研究生散發信見的非法行動，反而示威式地拒絕收回這些研究生在蘇聯科學院極體宿舍散扔的文件。這些人特別是劉道玉的挑釁行動，是明顯地想使蘇中兩國科學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係尖銳化。只是蘇聯工作人員的有分寸的克制，才避免了嚴重事件的發生。

當天晚上，潘大使又集體會見了我們 5 個人，讓我們彼此相互作了介紹。

梅文崗是大使館的二秘，是由外交部派來的；魯佩新是大使館文員，也是由交部派來的；王耀同是大使館經濟處的幹部，是國內外經部派出的；姚毅是蘇聯杜布拉原子能聯合研究所中國專家組的專職支部書記，是國內二支部派出的，是我們當中年齡偏大的一位黨的工作者；我也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紹。介紹完以後，潘大使向我們介紹了國內的大好形勢，也揭露了蘇共領導集團的內部矛盾。最後他說：「反華不得人心，反華沒有好下場。蘇聯視你們為不受歡迎的人，恰恰說明你們做得對、做得好。他們不歡迎你們，祖國人民歡迎你們，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革命者歡迎你們。」

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在蘇全體中國留學生的憤怒與抗議，來自莫斯科大学、包曼工學院、門捷列夫工學院等校的留學生代表紛紛趕到大使館，向我表示了慰問。在外地學習的留學生，也紛紛打電話到大使館，表達他們對蘇聯政府的

抗議和對被逐人員的聲援。事後，在蘇聯科學院的我的同學們集體來到大使館，個個都義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時，他們幫我清理了日常換洗衣服送來，其他沒有值錢的東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冊俄文專業書籍，我不能隨身攜帶回國。

在離開莫斯科的頭一天晚上，劉天明同志來到住處看我，徵詢還有甚麼要求。他說：「道玉同志，你的行為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會議上或是與蘇方面對面的辯論中，你都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原則性，是我國留學生的優秀代表。當然，對你個人來說，中斷了正在順利進行的學習，失去了獲得副博士學位的機會，這的確是可惜的。你馬上就要回國了，你有甚麼要求請提出來，我們留在這裡的同志可以幫你辦理。」

聽了他的話後我有些激動，說：「天民同志，我們相處一年多了，十分感謝你在工作上對我的幫助。這次中蘇論戰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也僅僅做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事，請不要過高的評價我。輟學是令人遺憾的，不是我不想為，而是蘇聯當局不讓我為，回國後我不會停止已開始的研究，爭取要做出成績來。」最後我握著他的手說：「天民同志，我決定把我一年半節省的 600 盧布捐贈給大使館，我已託付留在科學院的留學生代交，請你專交給有關領導，略表心意。」這時天民同志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他激動地說：「道玉同志，你在政治上立場堅定，生活上克勤克儉，令人欽佩，我一定向領導轉達你的拳拳愛國心。」

6 月 30 日下午 12 時許，我們乘大使館的專車，來到莫斯科的國際機場，那裏已有數百名為我們送行的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留學聲代表在等候。我們接受了留學生的獻花，同他們一一握手告別。當我登上蘇圖 - 104 航機舷梯，揮手向歡送的人們致意時，我眼睛溼潤了。再見吧，令人沮喪的莫斯科！

這一年的 7 月 1 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42 周年紀念日，正是在這一天早上，當太陽高高從東方升起之時，我們乘坐的蘇圖 - 104 班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這時機場的紅旗飄揚，鑼鼓喧天，口號聲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數千人聚集在這裡歡迎我們。當我們走下飛機旋梯時，接受了少先隊員們的獻花。國務院各有關部一委的負責人和我們一一握手，並親切地說：「黨中央歡迎你們！祖國人民歡迎你們！」

九、周總理的接見

從 1962 年 2 月 10 日離開北京，經過了 526 天的留學生活，我又回到了原點——北京留蘇預備部。不過不同的是：那時是一名留蘇預備生，而現在是一名輟學的歸國留學生；那時我名不經傳，現在作為“反修戰士”為世人所矚目；那時人們餓著肚皮，現在的經濟困難已經暫時過去，市場又出現了勃勃生機。

我住進了留蘇預備部的宿舍，那時學成歸國的數百留學生都住在那裡。由於時差、緊張、興奮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已經五個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極，眼淚滴濕了枕巾，還是不能入睡。領導得知以後，派醫生送來 100 片裝的一大瓶安眠藥，但我並沒有服用，擔心日後產生對藥物的依賴性。就這樣，我全憑意志力的力量來調整我的心理，維持頻繁的外事活動。

7 月 7 日，是一個晴空萬里的日子，初夏的北京並不炎熱，這一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各界萬人大會，歡迎被蘇聯驅逐的五位“反修戰士”。大會十時開始，我們 5 箇人被安排在主席臺第一排與各部委領導交叉就座。大會主席臺上方橫幅是：“熱烈歡迎反修戰士勝利歸來”，與此對應，在大會會場後上方的標語是“高舉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旗幟把反對現代修正的鬥爭進行到底！”在會場左側上方口號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右側的口號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大會在威嚴雄壯的《國際歌》聲中開始，首都少先隊員向我們獻了鮮花。首先，北京市一位領導同志致歡迎詞，他對我們的光榮歸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他還闡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揭露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反華的行徑，表示要把反修反霸到鬥爭進行到底。接著，梅文崗同志代表我們 5 個人發言，他感謝黨中央對我們的關懷，感謝首都人民對我們的熱烈歡迎。他還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以及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揭露了蘇聯內部矛盾，駁斥蘇聯對我國的種種誣衊。隨後，中央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也相繼發言，一次次激情的發言，就像一篇篇戰鬥的檄文，是投向蘇修叛徒集團的匕首。最後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講話，

他指出：「我們一定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革命原則，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絕不做任何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這次大會，實際是一次顯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的大會，是一次聲討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大會。

7月13日，是我一生不會忘懷的日子，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在大會堂親切地接見了我們。接見是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進行的。大約9點半，我們5個“反修戰士”已經來到接待廳，隨後外交部副部長曾涵泉、外經部副部長李強、高教部副部長劉愷鳳等也陸續到達。十點整，周總理健步走入接見廳，他依序來到我們面前，一一和我們握了手，並揮手示意，叫我們坐下。他表情嚴肅、氣憤地指出：「蘇共完全背叛了馬列主義，他們越滑越遠了，現在竟然不顧國際關係準則，撕毀教育與科研合作協議，驅趕我外交人員和留學生。他們這些做法，讓全世界人民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他們反華的企圖，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接著周總理一改嚴肅的表情和顏悅色地與我們拉起了家常，從工作單位到婚姻、家庭——都問到了。當他問到我學甚麼專業時。我說：「是研究有機化學的，與國防軍工關係密切。」他說：「你既然是搞國防軍工科研的，我建議你到中國軍事科學院去工作，你覺得怎麼樣？」我說：「謝謝總理的關懷，我是由武漢大學派遣培養的，還是回去報效母校吧！」周總理說：「那也好、我不勉強你。」當30年後我回憶往事時，覺得那是我人生的一個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總理的建議，也許我就走上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15日晚，陳毅副總理在絨線胡同四川飯店宴請我們5個人，參加作陪的有副總理兼中宣部長陸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經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負責人20多人。據說，這家飯店是北京最有名的正宗川菜館，看得出這是陳毅同志相中的。這家飯館是由三層四合院組成，院內雕梁畫棟，鮮花馥鬱，優美典雅。

當陳毅等領導同志到達時，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只聽他大聲開玩笑地說：「今天是歡迎誰是你們還是我？這是喧賓奪主嘛！」然後我們按照編排的名單入座，宴會開始時，陳毅同志舉杯向我們表示歡迎，然後他話鋒一轉說：

「連日以來你們辛苦了，今晚徹底放鬆，我們不談政治，修正主義不是一個晚上能批倒的，是長期任務。」在席間，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去年在北京請美食家品嚐和評比全國名菜，結果川菜、蘇菜和粵菜得票一樣多，不分伯仲。有人建議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投一票，尊重科學嘛！結果呢？川菜以一票的優勢得了第一，而蘇菜和粵菜並列第二，哈哈，你們猜猜奧妙在哪裡？」

那天晚上，我的確過得很愉快，特別是陳毅元帥的威嚴、機制和幽默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

大約8月初，李達校長托秘書曾勉之同志帶信給我，他希望能見到我，那時他正在北京頤和園休假。我依約到頤和園去看望他，向他匯報了我的學習和返修情況，老校長見到我十分高興，中午設家宴款待我。席間，老校長談興甚濃，他說：「現代修正主義是一股國際思想，要從理倫上把他批透，馬克思主義理倫家還需要做極大的努力，近來我一直在作這方面的思考。」接著他又談到了武漢大學的問題。他說：「學校圍繞著1958年教育的問題，黨委分成了兩派，鬥得不可開交，已經影響了教學質量和科學研究。武大的學術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學校工作，正確執行黨的教育方針，狠抓科學研究，為辦好武漢大學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以後的兩個多月裡，我一方面要到外交部與高教部匯報在蘇聯學習和反修鬥爭的一些情況，接待記者和各方面的訪問；另一方面，我又要參加歸國留學生的形勢教育學習。我們先後聽取了外交部、高教部和國家計委等單位關於國際國內的形勢報告，參觀了首都鋼鐵公司、密雲水庫、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工農業建設成就，受到一次大好形勢的教育，增強了對國家經濟建設的信心。

（第三章完，全文待續）

編輯小語：劉道玉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任武漢大學校長期中（1881至1988），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序幕，對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作者著作甚多。